



1921-1925:

中国文学档案

ZHONGGUO
WENXUEDANGAN

张勇 著

1921-1925

中国文学档案

——“五四”传媒语境中的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1921-1925

中国文学档案

——“五四”传媒语境中的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

张勇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21 ~ 1925 中国文学档案: “五四”传媒语境中的
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 / 张勇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209-06781-2

I. ① 1… II. ① 张… III. ① 创造社—期刊—新闻事
业史—研究—1921 ~ 1925 IV. ① G239. 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5502 号

责任编辑: 王 晶
封面设计: 张丽娜

1921 ~ 1925 中国文学档案

— “五四”传媒语境中的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

张 勇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781-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634-6276022

作为对于五四新文学社团的研究,创造社研究应该属于比较早就被关注到的研究领域。二十年前曾在北京举行过创造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一个主议题的学术会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算是领一时之先的。

虽然如此,创造社研究似乎并未拓展开来,也没有多么深入进去,乃至如本书作者所说的,陷入一个“研究困境之中”。个中原因,书中已经作了深入的分析。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范畴,已有的创造社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论述历史,是以史论的方式对于创造社的存在、创造社的活动进行阐释和评说。这显然是沿用一直以来文学史书写与研究的路数。所以,“前期创造社研究的盲点还大量存在着”(书中语),因为首先是有许多历史盲点的存在,前期创造社如此,后期创造社更是如此。缺少对于历史完整细致的描述,就难有切中肯綮的历史研究。

作者在本书标题上冠有“档案”二字,其用意不言而喻:他首先是在做“发现历史”、描述历史的工作,然后再进入思考、研究。

以前期创造社所办系列期刊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从文学传播方式与期刊传播媒介的角度,去探究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和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存在的意义,无疑是确立了一个创造社研究极好的视角。

创造社的涵义,并不就是人们习惯了去面对的一群作家的文章、作品以及他们参与的种种论争。那应该是与一群文学青年、文学同仁们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史事、史迹、文献所构成的一个历史存在。所以许多貌似无足轻重的历史细节,反倒为“发现”创造社提示了很好的切入点。

创造社可以说是始于办刊、终于办刊(出版部被查封,当然也关系到其刊物),“创造”系列的刊物最能反映创造社存在的真实状态及其社团特征,当然不仅是在文章作品之内,也在文字之外。譬如,我就想到在《创造》季刊上刊

载的一篇作品和附于篇末的几段文字。

那是成仿吾发表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该小说的篇末,依次刊载了郁达夫、郑伯奇、郭沫若、陈君哲,还有成仿吾自己,为这篇作品各自写下的评论文字,或是读后志感,郭沫若则写了一首诗。

如果就文字说文字,这只是成仿吾一个作品的文本和与之相关联的几段批评文字在创造社刊物的发表。但是这样编排出来的这些文字背后,实际上记述了《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修改定稿的过程:成仿吾将小说的初稿寄给在京都的郑伯奇,郑伯奇读后转寄在福冈的郭沫若,郭沫若题诗后又传给陈君哲看,然后寄往东京的郁达夫处,最后返回成仿吾手中。在稿子邮寄传递过程中,每个人都表达了看法,成仿吾根据几位朋友的批评意见,最后才将《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改作成文。(这一经过的描述,要结合到其他一些史料。同时从相关的史料中又能看到相似的情节也发生在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创作活动中。)

从这一历史情节深入进去,我们可以感知这样的信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群文学青年,就以这样的方式相互结识、相互交往,他们在这样的交往中进行文学写作、文学批评等活动,然后才有了那样一个创造社的成立,有了《创造》那样的文学期刊。

像这样可以让人去触摸到历史的信息,在前期创造社刊物上承载有很多。所以,本书的每一章都开掘出一个含蕴丰富的视界:前期创造社期刊在泰东图书局的出版发行、期刊的作者群、读者群、期刊栏目的设置等。作者正是从“传媒语境”切入进去所展开的这诸多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中,获得了对于前期创造社,对于一段历史独到的理解、认知和阐释。

认识张勇还是在他读书的时候,已经许多年了,那时他就在作创造社的研究。这部著作应该就是他多年学术思考和学术积累所得。古人谓“十年磨一剑”,今人没有这份耐心,当然也缺少相应的客观环境,但学问之事,“磨”的功夫还是少不了的。张勇有这份“磨”劲儿,也就能“磨”出学问的分量。

书稿读完了,获益良多,因为我在许多年前也曾作过点创造社研究,或者自己应该再作下去吧!于是,在有所得之外,对于这样一个创造社研究的课题,就又有了一点小小的期待:将“传媒语境”中的创造社期刊研究从创造社的前期延展到它的后期。

创造社在后期创办了自己的出版部,这是“创造十年”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关联并影响到后期创造社的许多活动。而从完全独立地进行创作、编辑、印制、发行出版物(包括其多种刊物)这一文学活动全过程的意义上,它之于后期创造社的办刊活动,是可以提供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这又能进一步深入对于前期创造社办刊活动的解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张勇或许已经在继续研究着呢。

蔡 震

2012,劳动节

目 录

序	1
导言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再思考	001
第一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创办动因探究	009
第二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编辑策划研究	023
一 前期创造社期刊的编辑方针	024
二 前期创造社期刊的编辑策划	027
三 前期创造社期刊编辑者的文化市场意识	043
第三章 泰东图书局与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出版发行	054
一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上海的出版发行环境	055
二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合作期间期刊的出版与发行	062
三 为什么郭沫若许多诗作没有收入《女神》	069
四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分手之后	076
五 由前期创造社期刊初版时间所想到的	085
第四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研究	091
一 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的建构	091
二 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聚散离合的背后	104
第五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读者”研究	112
一 前期创造社期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113

二	前期创造社期刊“读者”阅读期待的实现	117
三	前期创造社期刊的“读者”接受与文化市场建设	124
第六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栏目研究	129
一	前期创造社期刊栏目设置的特点	129
二	前期创造社期刊栏目设置与文学论争	141
第七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的文献价值重估	147
一	前期创造社期刊与创造社的“转向”	147
二	名人效应与媒体“包装”	157
三	前期创造社期刊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的影响	164
	结束语	180
	附录：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及栏目列表	183
	参考文献	190
	跋	198
	后记	201

导言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再思考

谈及创造社,我不由地想到了鲁迅先生有关“创造”脸的比拟。抛开论争时双方个人恩怨的纠缠和感性话语的言说,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以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等为代表的创造社同人,留在历史中的印记总是神气十足的创造神情和生命激情的极度夸张。创造社缘何能够对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这张“创造”脸为何又能给鲁迅、胡适、茅盾等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内心造成如此深刻、难以抚平的伤痕呢?对于此类相关问题的探究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创造社研究的淡化而渐渐失去了阐释的动力。^①

诚然,动力主要来源于对疑难问题的追究、新鲜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王晓明曾就现代文学的研究指出:“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当面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这一点似乎尤其明显,如果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文学研究会和它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②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创造社研究之中,如果仅仅是依靠同人的文学创作而没有“创造”系列期刊的创办,创造社还会在“五四”文坛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吗?他们一张张“创造”的面孔还能造成如此长久的影响吗?但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便

① 在中国知网(www.cnki.co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键词栏中键入“创造社”就会检索出,从2000年至今有关创造社研究的文章不足50篇,而且有分量、有突破的论文少之又少,更鲜有新鲜观点的提出,因此我认为现如今创造社研究相对于2000年以来讲正处于历史的低点。

②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50页。

可发现目前对创造社的解析恰恰陷入了这样的研究困境之中:过分注重文学创作个体艺术风格的阐释而相对忽视文学社团创作群体的集结;过分重视文艺思想的分析而相对忽视文学边缘场域的拓展。面对这样的研究现状,想要走出传统的路途依然充满了坎坷和艰辛,创造社研究的生长点究竟在何处呢?

调整以往研究的视角,我们发现与创造社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创造”系列期刊的出版发行,社团内外主要人员的交往与变动,个人家庭与社会生活的状况等看似文学活动边缘的因素,都时刻左右着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变迁,有时影响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主观认知的范畴。

创造社出现伊始就被称为突起于“五四”文坛的“异军”。所谓“异军”,也就是说在创造社身上存在着有别于当时其他文学社团的鲜明特征,也就是它独特的存在形态。以往对于创造社“异军”的阐释大多数是就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来谈的,也就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与张扬,但这方面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的异议。^①我们姑且将存有争议的创造社文艺思想的研究搁置起来,那么,是否还可以从现代文学传播方式及期刊传播媒介等角度来探究创造社“异军”的内蕴和由此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呢?

目前如果单纯从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对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并且取得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期刊传媒的研究就很不充分了,至少最近几年所逐渐兴起的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热潮从另一侧面就能说明我们现在研究的不足。其实,我们的文学研究一直缺乏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即从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等方面的关系切入。实际上,对于这些方面,我们所知甚少,即便是提及,也是将它们单纯地作为文学存在的“载体”,更为关键的却是两者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也就是作者与传媒及传媒方式与接受主体三者

^① 学术界对于前期创造社的文艺主张是否是浪漫主义的至今为止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对此问题魏建就在其专著《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的第五章对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主导说”加以否定,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的观点请参阅魏建的《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10页。童晓薇在《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所发表的《创造社与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一文,就认为创造社作家在文艺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上受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唯美主义为核心的文艺思潮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观。方长安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中的论文《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更是将前期创造社的文艺思想界定为自然主义。可见学术界对于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还存在着很多的异议。

之间的互动关系。

但是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目前来讲我们所做的还是不够,而且我们很多研究者可能还没有能够从应有的高度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至今为止我们连现代文学史上大约创办了多少种文学期刊都还没有能够确定下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一些期刊在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总是较少谈及,我们总习惯地认为,在文学运动中,重要的是作家、评论家和由他们所引发的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而对以编辑家或文学家兼任编辑者为核心而形成的期刊现象,几乎熟视无睹。其实,“中国的文坛和报刊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期刊的诞生和停刊所引发的文学创作的变革、文艺思潮的论争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现象,以及由这些现象所引发的以现代工业及商品社会为背景的现代文学发展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轨迹的变更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开始进入了学术界很少有人涉足的前期创造社文学发生的现场,通过对《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阅读和思考,以及对前期创造社原始资料的分析,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以往单纯阅读作家作品时的现场观感,通过这种文学现场的进入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创造社还存在明显地“异”于其他社团的特征。

首先,“异”表现在创造社创办刊物之早、数量之多在众多文学社团中是不多见的。创造社成立以前,郭沫若、陶晶孙、郁达夫、何畏、徐祖正、刘恺元曾在日本共同创办过一份由打字机打印的刊物《Green》。尽管这份刊物只印出两期就停办了,但它仍为创造社成立后“创造”系列期刊的创办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创造社从1921年6月正式成立至1930年实际停止活动为止的近十年的时间内,先后出版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周刊、《洪水》半月刊、《洪水周年增刊》、《创造月刊》、《A. 11.》周刊、《幻洲》周刊、《新消息》周刊、《文化批判》月刊、《流沙》半月刊、《畸形》半月刊、《思想》月刊、《日出旬刊》、《文艺生活》周刊、《新兴文化》月刊、《新思潮》月刊18种刊物。早于创造社成立,在中国现代文坛存在长达11年之久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会也仅仅改版过《小说月报》、承接过《文学旬刊》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8页。

(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创办过《诗》月刊。^① 相对于创造社而言,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数量是不多的。因此,创造社创办刊物意识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出版刊物之多、造成影响之深在现代中国文学社团中是不多见的。

“异”也表现在创造社成立过程上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文学社团的特性。创造社的成立,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酝酿时期,郭沫若等人也将此段历史形象地比喻为漫长的“受胎期”。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8月间,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与张资平相遇,谈起了创办纯文学期刊的设想,并商定邀请郁达夫、成仿吾参加,9月成仿吾到福冈,郭沫若将与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出。成仿吾表示赞同,但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组织工作因而未具体进行。此后,他们四人不断通信联系,努力进行新文学创作的尝试,并在日本积极“征集同志”。1921年4月初,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回到上海,成仿吾不久去了湖南,郭沫若则留在上海,在泰东图书局担任未正式受聘的编辑,筹备出版同人刊物。因人力单薄,两个月仍无结果,后来泰东图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刊物,郭沫若遂决定再去日本,“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郭沫若到日本后,先去京都找到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至东京联络了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期刊计划、期刊名称和刊期等一系列创办新文学刊物的问题,最后刊物定名为《创造》,暂时出季刊,创刊号稿件在暑假期间准备好。在这样的前提下,创造社才于1921年6月宣告成立。“受胎期”竟然如此漫长,而且过程也如此繁复,这在现代文学社团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社团成立过程中,刊物的创办始终是他们着力的中心,直到刊物确定下来后,以郭沫若为首的同人们才宣告了创造社的成立,这种举动也与其他文学社团有很大的区别。这也体现出了有“刊”才有“社”的现代文学社团的鲜明特征,更显示了与传统文学流派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创造社的成立是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现代性表征的集中而典型的体现。

“异”还表现在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出版时间上。早在1921年9月29日的《时事新报》中创造社就发表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而且还同时

^① 此处有关创造社所创办刊物的资料,来源于饶鸿竞等编的《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0页图表,文学研究会所创办刊物的资料来源于贾植芳等编的《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还参阅了刘增人纂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预告了创造社同人的名单、创刊号内容,但直到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才得以创刊^①,并且是十六开直排,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各期的《创造》季刊除了第一卷二、三期外都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出版,更有甚者,最后两卷出版的间隔时间,竟然长达近一年之久,这对于非常看重刊物出版的创造社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但更为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在稿件选择及栏目设置上前期创造社期刊也显示了独特性。在栏目设置上,《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栏目杂多,但是缺乏一贯的稳定性。每一期的栏目几乎各不相同,《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是诗歌、戏剧、小说、译文等纯文学的创作。但第一卷第二期就划分为创作、评论和杂录三大部分,虽然之后的《创造》季刊在大的栏目设置方面延续了这三大划分的方式,但是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如第一卷第四期增加了雪莱纪念专栏,杂录栏中既有游记又有演讲、既有翻译又有通信等内容。《创造周报》的栏目更是显示出杂多的特点,虽然这份刊物仅仅延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却出版了52期,其中共出现了评论、论说、批评、翻译、诗歌、小说、创作、介绍、答辩、杂感、童话、通信、感想、杂记、随笔、研究、读书录、对话、素描、寓言共20个形态各异的栏目,而且几乎没有连续两期栏目设置是相同的。当然编辑人员变更是栏目变化的一个原因,但除此之外的原因究竟何在,这种现象对于前期创造社的发展究竟是利还是弊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栏目变更中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创造社从纯文学的倡导到社会文化批判的明晰转变过程。这是否也能够映射出现代中国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化格局演变的过程呢?

在编辑人员的组成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方面,前期创造社期刊也显示出独特的一面。前期创造社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同人社团,而且同人是十分确定的,他们是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但是在《创造》季刊上诸如黄业初、袁家骅、方光焘、谢康、闻一多、梁实秋、张定璜、张友鸾、黄慎之、冯至、徐志摩、刘梦苇、王环心、王珏、楼建南、顾庆、施

^① 有关《创造》季刊的创刊时间,据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一文中记载是1922年5月1日,但是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中所注明的是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1922年5月1日,郁达夫刊登在创刊号的《编辑余谈》的时间是“一九二二,二,一三”,饶鸿竞等编的《创造社资料》中记载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也是1922年3月15日,因此我认为郑伯奇的回忆可能存在偏差,我在此论著中将《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定为1922年3月15日。

若皇、叶宗泰、朱公垂、赵邦杰、冷玲女士、淦女士、王怡庵 23 位连创造社成员也不是的人员赫然在列,占到季刊所出现作者总数的一半还要多,而在《创造周报》上更是相继出现了诸如周赞襄、梁实秋、方光焘、张闻天、白采、严良才、张非怯、洪为法、黄仲苏、刘海粟、张伯符、关良、袁家骅、露明女士、华清、田楚侨、焦尹孚、唐汉森、王以仁、鲁少飞、闻一多等作者的名字,也占到《创造周报》所出现作者总数的一半以上。^①从这方面来看,前期创造社并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在一个小圈子内同人间地互相唱和,其实前期创造社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文学社团。这种实际情形和最初设想的不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而且它的编辑人员也十分特别,《创造》季刊就是由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三个人分别编辑的。^②《创造周报》也主要是由郭沫若、成仿吾以及郑伯奇共同编辑完成的。作者的多元化、编辑的非专业化对于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影响何在呢?

前期创造社期刊在市场经营运作上也十分特别。《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销售的情形并不是很好。^③但是到了《创造周报》就完全不同了,郑伯奇在谈及当时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影响和业绩时,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④另外,据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⑤中的图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现代中国早期主要报刊发行量中《创造周报》排在了第 8 位。从这两则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在当时文化市场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创造社成员的论述中却很难看到有关于期刊经营问题的论述,或者是稿费分配的问题。稿费、市场这在当时已经是趋于成熟的事物,但是前期创造社成员有关这方面却很少论及,这是否也是前期创造社难以为继的原因呢?

“异”还体现在前期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之间微妙的关系上。泰东图书

① 《创造》季刊共有 40 位作者出现,《创造周报》共有 36 位作者,详细名单请参阅本论著的第四章《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研究》。

② 《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则“创造社启事”的编辑联合署名中出现了邓均吾的名字,但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他独立编辑过《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很可能邓均吾时常参与《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因此本文还是认为《创造》季刊主要是由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轮流编辑而成的。

③ 此处参阅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1 页。

④ 成仿吾:《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59 页。

⑤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1 页。

局的出现对于创造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张静庐曾形象地比喻为“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①。借助于泰东图书局,前期创造社期刊得以出版发行,泰东图书局也出现了短暂的强盛。但当它们分手后,前期创造社期刊无力为继,成员作品的发表更无从谈及,而泰东图书局也从此一蹶不振。它们之间既紧张又依存,既斗争又合作的现象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相当独特的。考察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的合作,我惊异地发现双方就出版事宜并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协议。这种不同于其他出版机构与社团关系的现象是泰东图书局有意为之,还是创造社的疏忽,抑或另有原因呢?

由《创造》季刊的创办和出版竟然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规模巨大的两场内部论争,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发展以来史无前例的。1922年5月11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7期起连续三期以笔名“损”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评论《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主要作品,并针对郭沫若、郁达夫的文章说:“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质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由于这篇文章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性的论争,这也首开了新文学内部论争的先河。随之而起的便是前期创造社与胡适就文学翻译问题所引发的另外一场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争论,前期创造社为什么总是充当了论争的挑起者呢?他们究竟在论争些什么问题?论争的真正目的何在呢?透过这两场论争我们又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异”也同样反映在当《创造》季刊人力、财力与物力均不济的情况下,前期创造社期刊编辑者反而创办了《创造周报》。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由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的发刊词《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中说:“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但正是在《创造周报》期间,《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被无限地搁置起来,使得第二卷第一期和第二卷第二期之间的出版时间竟然相隔了一年之久。这种选择对于创造社文学创作风格的改变和文化方向的转换有何影响呢?它的意义何在呢?

如此众多的异样现象造成了前期创造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存

^①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局1938年版,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00页。

在形态,而这些大都是围绕着《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创办与出版而展开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和所有的挑战都是因为创办了期刊而起;创造社之所以被文坛所重视也是因为《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所造成的影响;前期创造社文化主张与着力点的变化也可以从刊物发展与变化中找到端倪;创造社同人之间的聚合也与刊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期创造社期刊所出现的诸多异样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研究和走进前期创造社神秘内部世界和文学创作原始现场的另一路径。

释疑的强大诱惑力促使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踏进了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社成立时新旧交杂的“五四”文坛那段热闹纷繁的岁月,驻足于《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感受着前期创造社成员时而兴奋异常、时而痛不欲生、时而无所顾忌、时而忧心忡忡的敏感神经,触摸着已经泛黄、布满尘埃的前期创造社期刊,发现自己无疑是选择了一条难以找寻捷径的研究之路。但每当想到《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所蕴涵的丰富原始宝藏,以及时常萦绕在耳畔的他们面对非难和抗争所合奏出来的真诚而坚韧的生命交响曲时,都坚定了我返回前期创造社文学现场、厘清前期创造社研究中的诸多疑点和争议进而回答前期创造社复杂而特异存在原因的勇气和脚步。

第一章 前期创造社期刊创办动因探究

陈平原曾指出：“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①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认识和被广泛认同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思路强调“触摸历史”、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重视对文学原生态的描绘和对研究对象的贴近与理解。作为对因远离文学和文学史本身而显得“大而无当”研究现状的反驳，近年来报刊不仅成为众多的文学史家深入开掘的领地，也被列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基本的学术训练科目，由此便生成了我从事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的初衷。^②

纵览以《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期刊，我很快就被

①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第17版。

② 在此部论著中，我参阅了黄淳浩先生在《创造社分期刍议》一文中有关创造社分期问题的观点，将前期创造社活动时间界定为1921年6月至1924年5月，因此我将前期创造社期刊界定为《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但并没有包括1923年7月21日至1923年11月2日创办出版了100期、历时104天的《创造日》。因为我认为虽然《创造日》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等前期创造社同人编辑而成，但它是以《中华新报》副刊的形式出现，它包含有政治、经济、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在形成方式、编辑方针、人员构成等方面与《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都有所不同。更为关键的是，《创造日》创刊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抗”与文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的日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需要和作为“消纳外来稿件的尾闾”，同时也是为了“对于新旧出版物的一种监察与批评的工作”。但在现实运作中《创造日》并没有能够实现以上目的，它缺乏前期创造社的激情和锐气，少有论战性文章。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创造日》与《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风格迥然相异，因此本论著没有将它纳入前期创造社期刊的论述范围之内。而1924年8月20日创办的《洪水》周刊，虽然是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了一期，但它并不在本论著所考察的时间范围之内，因此也没有提及。